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 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检视与反思(1945—2021)

孟广林 朱文旭

[摘要] 七十年来,台湾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建树,其发展进程可大致划分为1945—1969年的草创时期、1970—1989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0—2021年的新阶段。检视其议题和理路即可发现,台湾学界重点关注15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尤其是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追踪西方史学潮流为能事,研究视角呈现“从中国看世界”到“从台湾看周边”的位移。由此,在继承民国西洋史以建构本土世界史教研体系、推动本土史学发展和繁荣华语世界史学术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进展。不过,由于未对学术主体意识的建构予以足够重视,难免滋生诸如话语体系缺失、研究议题分散、学脉赍续孱弱、意识形态纷扰等诸多流弊。破解这些难题,确需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学术交流,而这也是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课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西洋史;学术主体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K092;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2)02-0088-16

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术研究上亦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囿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呈现出与祖国大陆不同的面相。为此,学界曾对台湾历史学中的中国史、台湾史和史学史等研究进行过专题考察<sup>①</sup>。然而,两岸学者对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却缺乏足够的检视与反思。2019年以来,大陆学界陆续对七十年来中国世界史不同领域的进展和学科建设予以总结概述<sup>②</sup>,但其中未见台湾史学流变的相关影迹。台湾本土学者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也明显不足<sup>③</sup>。1997年,杨肃献(Su-Hsien Yang)曾对1950—1995年间台湾“西洋史”研究进行总结。林美香(May-Shine Lin)则在2012年为1950—2009年间台湾的英国史研究撰写专文回顾<sup>④</sup>。同时,杨肃献还参与了台湾当局“国家科学会人文中心”的“台湾人文学界近数十年来研究成果详细报告——历史学门”的工作,与童长义、王世宗一起完成了“世界史”卷的编纂<sup>⑤</sup>。不过,这些相关成果不足以反映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动向,且未见学者对1945年来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杨文“特别声明”<sup>⑥</sup>的基础上,梳理台湾世界史研究七十年来变迁脉络、发展概况、总体成就

① 相关讨论主要有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胡逢祥、李远涛:《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高明士主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年版;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9期;《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4期,2001年。

② 钱乘旦:《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马克垚:《70年砥砺前行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王立新:《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张建华:《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晏绍祥:《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等。

③ 周建:《近十年来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概况简述》,《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5卷,1993年,第267~275页。

④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12期,第295~338页;林美香:《英国史在台湾的研究与发展,1950—2009》,林建甫编:《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展望(1949—2009)》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375页。

⑤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年版。

⑥ 杨肃献讨论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时提出:分析对象仅限于正式研究论文,不包括书评、译文;“西洋史”是“纯”西洋史,不包括中外关系史;原则上只讨论台湾西洋史研究概括,外国(地区)学者在台湾发表的西洋史论文不纳入考虑范围;讨论限于“量”而不涉及论文研究“品质”(参见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12期,第304页)。

与不足之处,进而将其纳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进路中进行考量。管见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sup>①</sup>。

### 一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脉络流变

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世界史研究一脉相承,共同源于辛亥革命后传入中国的西洋史,其端绪往往被学界上溯至晚清“睁眼看世界”之际<sup>②</sup>。在大陆,严格地说世界史学科建构于1949年,正如齐世荣先生指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四十年间,我国实际上只有外国史(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sup>③</sup>。1949年,当大陆开始建构世界史学科之际,西洋史中的一批学人追随败走的国民党政权南渡台湾。由是,大陆世界史学界对台湾西洋史概念了解不多,有必要对其予以辨析。

事实上,“西洋史”在台湾语境中的所指几经变动,晚近语义扩张,逐渐和“世界史”指代相近,交替使用。早在1924年,陈衡哲在其所撰《西洋史》中开宗明义道,“本书的范围以‘文化上的欧洲’,及纯粹欧化的美洲为限,故定名曰西洋史”<sup>④</sup>;她对此作进一步解释说,“欧洲历史的范围,比欧洲的地理范围,略为宽广;因为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各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人种上,语言上,都是与欧洲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历史学家,把非洲的北部,和亚洲西方的一小部归入欧洲历史范围之内,做成一个历史上的单位,叫做‘文化的欧洲’(Culture Europe),以区别于地理的欧洲(Geographical Europe)”<sup>⑤</sup>。此时,“西洋史”是“文化上的欧洲”历史。这一观点为迁台学人所承袭。1985年,彭小甫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对“西洋史”概念进行过集中的讨论。他认为:“历史上的欧洲则不得以此天然地形(乌拉尔山与里海以西,高加索山与黑海以北的地区)为界限,其范围乃随历史时代而伸缩……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下,任何国家不得置身局外,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虽分犹合。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洋史势必涉及大部分世界史,其牵涉范围则因其所讨论的时代而异。就表面观之,‘西洋史’一词,含义暧昧,大则可为‘世界史’‘外国史’的代表词;小则仅指‘欧洲史’或‘欧美史’;就内涵窥之,则此等名词实大同而小异。”<sup>⑥</sup>这种泛化的西洋史概念得到了台湾主流学界的认可<sup>⑦</sup>。2003年,童长义、杨肃献和王世宗三人编订《战后台湾的历史研究,1945—2000》,第八册便以“世界史”为题,包含“亚洲史”和“西洋史”两篇。林正珍也将“西洋史”与“世界史”作替换概念使用<sup>⑧</sup>。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具体的研究领域视之,“西洋史”断然不能同“世界史”等同;然而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台湾语境中的“西洋史”和“世界史”可交替使用。本文主要关注台湾地区世界史作为一个与中国史相对照的学科在过往76年的发展变迁,因此统一作“台湾世界史”展开。

具体到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草创,则可以概括为日据文献遗存、迁台学者开拓和本土历史学科的给养等共同形塑的结果<sup>⑨</sup>。1945年日本战败与台湾回归中国后,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台湾大学前身)下设有“西洋史学、史学地理学讲座”<sup>⑩</sup>,其遗存的文献成为此后

① 本文将聚焦台湾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对1945—2021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进行考察和梳理,辅以必要的硕博学位论文以及学术著作进行补充论证。对此种取舍作如下说明,第一,在学术论文发表尚未取得规模效应之时,笔者主要依靠专著、译著和杂文展开;第二,当学术论文(不包括专供硕博研究生发表习作之刊物载文)发表规范化后,则更多地关注前者折射出来的研究趋势与特征;第三,七十年来台湾世界史硕博论文、学术专著数量众多,彭明辉、林美香等学者已有专论,且对上述两大类型成果进行论述非一文所能及,这需要学界后续的关注与投入;第四,对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以及某些专著是本文写作的参考范围。当然,以上为笔者愚见,文责自负。

② 张秀蓉:《台湾大学历史系所学生对西洋史的观点与教学评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9年第16期,第353页。

③ 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5~156页。

④⑤ 陈衡哲:《西洋史》上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例言”第9页、正文第27~28页。

⑥ 彭小甫:《当前“我国”大学西洋史教育剖析——“我国”各大学西洋史任课教师施教实况及其改革意见调查研究》,载于台湾师范大学主办之《国际历史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印行1985年版,第243~244页。

⑦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12期,第295页。

⑧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9期,第175~197页。林正珍同时也将“世界史”看作是一种突破西方中心论历史叙事的新史观,这种语境下的“世界史”与中国大陆语境中的“全球史”指代相近。

⑨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第60页。

⑩ 更为细致的分科可见叶碧苓:《台北帝国大学与京城帝国大学史学科之比较(1926—1945)》,《台湾史研究》第16卷第3期,2009年,第87~132页。

台湾大学西洋史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在1949年一批渡海迁台的颇有声望之史学学者中,沈刚伯、刘崇鋈、徐子明、张贵永、高亚伟等专长于西洋史,他们构成了台湾早期世界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sup>①</sup>。除此之外,台湾历史学的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世界史研究的进路。1949年后,中国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台湾史学研究的主流,迄今仍然如此。傅斯年、姚从吾、李济和董作宾等“史料学派”的代表迁台,在“史学本是史料学”<sup>②</sup>的号召下,台湾的世界史学科得以借此落地生根。

七十年来,台湾世界史发展历程引人注目。在此,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分期作简要回顾。杜正胜、王晴佳和彭明辉等学者大都将台湾的历史学划分为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史料学派”和传统史学主导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87年西方学界辐射台湾史学研究与1990年后台湾史兴起这三个阶段<sup>③</sup>。这类分期基本上舍弃了对世界史的观照。而台湾的世界史学者迄今未见相关讨论,唯有杨肃献曾将1967年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建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界的代际交替和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学生和学者赴海外研习西洋史等作为台湾世界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分期<sup>④</sup>。事实上,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的研究既与台湾整体历史学发展趋势相吻合,又有自身独特的学术走向。根据台湾本土专业系所的历史、学者代际传承、世界史教学、专业刊物、论著成果(以论文为主体)以及影响学术的政治形势,可以将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大致分为1945—1969年、1970—1989年和1990年至今这三个时期。

1945—1969年间,台湾的世界史在日寇溃败、国民党退守后,依托撤离大陆的学者得以草创。这一时期,台湾的世界史相当孱弱,加之当局实施“戒严”束缚学术的自由发展,西洋史研究自然深受波及。首先,能够开设课程的院校稀少、师资严重不足。台湾世界史研究领域占据主体地位的12个院所<sup>⑤</sup>,在1949—1954年间大半尚未复校或成立,唯有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家独大。随着辅仁大学等一批高校在60年代纷纷复校建立历史系,情况方才好转。其次,学者多将西洋史教学作为兼职,主要精力在于教学而少著述。这可从沈刚伯和王任光两学者得窥一斑。沈刚伯可谓中国埃及学研究第一人,1924接受政府资助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研读埃及学、英国史和宪政史。他专注于教学传授而鲜有学术著述,辑录于其身后的文集有“历史”“哲学与文学”“教育”“世局”和“记事”等五种主题,文章115篇;而在同文史相关的49篇文字中,4篇为西洋史、6篇涉及中西比较,西洋史居于其中的位次可见一斑<sup>⑥</sup>。沈氏当然并非个例,其经历和旨趣当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在台湾的缩影。曾执教台湾大学、主导辅仁大学西洋史学科的王任光亦是如此<sup>⑦</sup>。此外,此阶段的台湾世界史学术论著以翻译为主,罕见独力产出。王任光就曾感叹:“大学里有关西洋史方面图书和学报的缺乏,学术论文之少见,都显示我们对西洋史研究的忽视。”同时,日本学者所写的“罗马帝国”被台湾学者翻译,更令他“惭愧”,有颇受挑战之感<sup>⑧</sup>。这无疑是1970年前台湾世界史学科的真实写照。

1970年后,台湾世界史研究开始明显发展。这得益于留学人员纷纷返台、学术期刊发行常态化以及当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开始引进,专业学术发表的园地日渐开拓。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王任光、孙同勋、庄尚武、蒋孝瑀、高明士和古伟瀛等一批留学人员

① 遗存文献有剑桥系列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丛书,以及完整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等名刊。有学者认为,台湾西洋史研究并没有传承日据的学术脉络。参见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第60~65页。

② “史学本是史料学”语出自许冠三,是他根据傅斯年之“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断发挥而来(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31~259页)。

③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彭明辉:《从历史学期刊论文分析台湾史学研究动向(1945—2000)》,《政大历史学报》2002年第19期。

④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第60~67页。

⑤ 这12个院所分别为“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成功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国立中兴大学”、东吴大学(台北)、淡江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新竹)和“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⑥ 沈刚伯:《沈刚伯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2年版。

⑦⑧ 参见王任光、黄俊杰编:《古代希腊史研究论集·序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9年版,第5~8、5、6页。

返台后前往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和政治大学等高校任教,台湾的世界史教学科研队伍建构渐有起色<sup>①</sup>。随后,辅仁大学在1967年成立历史研究所,侧重于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台湾大学也在同年创设博士班培养高级人才,健全本土西洋史人才培养体系。此外,伴随《食货月刊》在1971年复刊、《台大历史学报》在1974年创刊,西洋史科研成果在70年代开始小规模地持续刊发(见表1)。由此,台湾世界史教学与科研在20世纪70年代后初具规模。到1985年,台湾世界史学科11个院所共有各类教研人员约54人,规模与现在相当<sup>②</sup>。

表1 不同时段台湾世界史论文刊发表<sup>③</sup>

类别	古代史	中世纪史	近代史	现代史	其他	合计
1945—1969	2	2	4	1	6	15
1970—1979	15	7	33	13	21	89
1980—1989	13	14	39	27	20	113
1990—1999	12	18	53	62	41	186
2000—2009	6	13	47	22	40	128
2010—2021	10	12	79	46	30	177
合计	58	66	255	171	158	708

这一时期台湾世界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集中体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少、学术议题分散。以世界史发文量为例,1970—1979年间见刊论文89篇、1980—1989年为113篇。这一数字较1945—1969年的15篇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数无疑偏少。此外,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侧重近现代史学,1970—1989两个十年间,古代中世纪史论文合计为22和27篇,占比24.7%和23.9%。同时,相关的学术议题则以通识和引介为主,学术理路倾向于中西比较和从台湾出发看世界,少见独到的专论。结合彼时台湾当局“戒严”的政局,考虑到台湾世界史研究起步不长的历程和学术社团的规模,这一状态自在情理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世界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总的来说,政策支撑、专业期刊涌现和新生代学者增多铸就了台湾世界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早在1980年,台湾“教育部”就开始通过公费留学考试选派学生赴欧美攻读西洋史。这批留学生大都能完成学位,并陆续返台进入各大学历史系。他们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也纷纷著述,“发表具有学术价值的西洋史论文,大幅提升台湾西洋史研究水平”<sup>④</sup>。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缓解了笼罩学术研究的紧张政治气氛。1989年,台湾世界史迎来了第一本专业期刊——《西洋史集刊》,学术成果刊发环境进一步改善。当然,科研实力的提升归根到底依赖于专业学者的勤奋钻研。20世纪90年代后,王世宗、杨肃献、花亦

① 王任光为伦敦大学1957届博士;孙同勋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1972届博士;庄尚武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研究硕士、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高明士为日本东京大学1983届东洋史博士;古伟瀛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83届博士。

② 李徽:《以史观今:两岸世界史研究开启新模式》,《今日中国》2014年第9期,第68~69页。

③ 本表系笔者依据收集的1950—2021年台湾主要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及其研究主题时间(段)所作,制表时间为2021年9月。有如下几点特此说明:第一,历史分期依次是古代史(?—500年)、中古史(500—1500年)、近代史(1500—1900年)和现代史(1900年至今);第二,笔者收集的论文原始数据800余篇,删去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史原》、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办《史学研究》《史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刊物《史耘》和东吴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学报《史轍》等专供学生发表的刊物论文,剩余708篇;第三,“其他”主要是不涉及具体史实研究的论文,例如历史哲学、历史教学和史学理论类的论文。

④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第62页。

芬和林美香等一批接受西方史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开始崭露头角,至今仍然活跃在台湾世界史学术界<sup>①</sup>。他们接受了英美高校的系统学术训练,在各自细分领域密切追踪学术动态且笔耕不辍,推动台湾世界史研究近年来在微观领域向欧美学者靠近,以至在一些具体议题的研究上不遑多让。

另一方面,透过表1可以看出,1970年以后台湾世界史发文量逐步攀升;1990—1999年间刊发高达186篇;2000年至今的两个十年间略有回落,同1980—1989年发文量相当。这一现象似与前文分期冲突。然而,事实是台湾历史学门类学术竞争加剧、希冀通过期刊评比缩减论文刊发数量以提升人文学界研究水准的结果。据笔者统计,七十余年台湾世界史刊发的学术论文分布于四十余家期刊,其中《台大历史学报》《新史学》《辅仁历史学报》《成大历史学报》《政大历史学报》《台湾师大历史学报》《西洋史集刊》《思与言》和《欧美研究》(更名前为《美国研究》)等是台湾世界史发表的重要园地,这9种刊物承载了半数以上的成果。上述历史学重要的刊发园地在20世纪90年代末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97年,在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支持下,由杜正胜牵头,展开对台湾历史学门类的期刊进行审核、评比并排序。随后分别在杜正胜和黄宽重的主持下相继于2002—2003年、2008年进行评比<sup>②</sup>。同时,台湾“国科会社科中心第五次执行委员会”也于2000年讨论通过首批“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要点”(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2013年3月修订为“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要点”),对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审。这些评比排名对学术期刊提出诸如“一年出刊两期作为优良期刊的基本要求”的硬性规定,并对期刊的出刊频次、稿件来源、退稿率、载文数量、延误与否、转引率和“国科会奖项的比率”等也都做出详细的评分细则<sup>③</sup>。《西洋史集刊》在此种压力之下停刊,《台大历史学报》和《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分别于1999年、2005年由年刊更改为半年刊。2005年,时任成功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王文霞在停刊公告中说:“这些年来西洋史学者研究累积的成果,对学术界必有一定的贡献;而现在迫于现实环境,必须告一段落。环顾‘国内’(中国台湾)历史学界,至今仍然缺少这类的专业期刊,大多数论文分散于各大学的历史学报,没有一份专业刊物统整这些文章。”<sup>④</sup>这样一来,台湾世界史成果也就在20世纪90年代“井喷”后遭遇挫折,但总体上依旧保持着缓慢增长的态势。

## 二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聚焦于何处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影响学者思考和立论的问题意识,即其治学旨趣在这一时段所呈现的特征与变迁,无疑是理解台湾世界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sup>⑤</sup>。自《大陆杂志》在1956年刊载徐先尧的《德国迈乃克教授的历史学》一文以来,台湾学界迄今已在《台大历史学报》《食货月刊》《西洋史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世界史论文达七百余篇,学术成果堪称丰硕。深入其中,即可管窥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旨趣、问题聚焦及立论关怀。这里将在对学术史总体概况予

① 1990年后,台湾公费出岛攻读世界史的人数众多,这里仅列举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数位。其中王世宗在1982—1988年于台湾大学取得历史学本科和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杨肃献于1973—1980年间在台湾大学历史学本科和硕士学位,1984—1990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哈里·迪金森(H. T. Dickinson);花亦芬在1983—1987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1997和1999年分别取得德国科隆大学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林美香在台湾大学取得历史学本科和硕士学位,1996年获得台湾“教育部”公费留学奖学金前往爱丁堡大学,2000年毕业。

② 杜正胜、陈国栋、柳立言:《“国内”历史学学术期刊排序计划”简介》,《汉学研究通讯》1998年第68期,第441~459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执行,杜正胜、陈国栋、林丽月主持:《“国内”历史学专业期刊评比排序之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第5卷第2期,2004年,第46~49页;黄宽重主持:《“历史学门类‘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97-2410-H-001-004。

③ 杜正胜、陈国栋、柳立言:《“国内”历史学学术期刊排序计划”简介》,《汉学研究通讯》1998年第68期,第453~459页;黄宽重主持:《“历史学门类‘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97-2410-H-001-004。

④ 王文霞:《〈西洋史集刊〉停刊公告》,《西洋史集刊》2005年第13期卷首。

⑤ 此处受黄宗智先生启发。他认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方,由此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美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第155页。

以梳理的基础上,围绕着学界热议的问题及其变迁,来展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重心和趋势,透过他们的阐释逻辑呈现台湾世界史的多元取向。

与中国史不同,世界史为学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域与主题,此为世界史长处之所在,但也不可避免地给研究带来分散化的弊端。这对于相关研究人数体量极其有限的台湾学界更是如此,表1即可为证。图示显示,古代中世纪史(公元前—1500年)在台湾世界史学术群体中颇受冷遇,世界上古史研究后继乏力,中世纪史研究成果也较为少见;相应的,台湾的世界史学者大都热衷于对世界近现代史(1500年至今)的研讨,1800年后的历史研究最为热门,学术成果往往集中于此。

在笔者收集的708篇论文中,有58篇研究主题分布在公元500年之前,占比8.19%。其中,蒲慕洲(8篇)、邢义田(7篇)、黄俊杰(6篇)、刘景辉(5篇)和王任光(3篇)等人发文较多,占据上古史论文半数以上。他们如今或已退休辞世、或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奠定台湾早期世界史研究的王任光在1993年离世,曾专注于上古史的蒲慕洲和邢义田早已转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21世纪以来,成功大学的翁佳声、东吴大学的何宛倩和徐诗薇(Shih-Wei Hsu)表现较为活跃,而徐诗薇已于2017年进入大陆南开大学任教。所以,总体看来台湾上古史人才储备不多,他们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一时颇为落寞。类似地,中世纪史的成果也不多见,七十多年来仅有66篇学术论文,占比约9.32%。世界近现代史讨论的热络则与古代中世纪史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近年来刊出论文426篇,占比60.17%<sup>①</sup>,侧身其中的学者人数众多、成果产出较多,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研究主题。同时,还有不少成果追踪学术思潮、关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等相关议题。由此可见,台湾学界对中世纪史的关注略强于古代史,学者则普遍聚焦世界近现代史,对西方史学潮流保持着相当的兴趣。但是,欲对1945年来的台湾世界史研究有着更为深刻、具体的认识,则需要对学者们的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具体到台湾世界史学者的议题,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对西方史学史、晚近的学术大家以及西学思潮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一特征在世界史研究起步阶段尤其明显,相关成果集中发表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其时以人物的思想及其学说为中心的研究,满足了台湾学界搭建学科框架和追踪学术前沿的诉求。以史学史的研究为例,他们从与台湾学界关系密切的西方学者出发,逐步发散,引介西方史学的不同流派。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界讨论较多的西方史家<sup>②</sup>,这同他的门生、西洋史学者张贵永的推崇不无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界更加注重西方史学潮流,既对汤因比、年鉴学派多有关注<sup>③</sup>;也注重借鉴一些细分领域中的翘楚如英国史家阿克顿勋爵、中世纪经济史名家亨利·皮朗和洛佩兹、俄籍古代史专家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的研究<sup>④</sup>。同时,晚近西方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为台湾西洋史学者引介,他们对马克斯·韦伯关注尤多,“中国历史学会”(台湾)的《史学评论》一刊在1985年推出韦伯专题研究。然而,1990年以来,这一学术潮流趋缓,世界史学者转而追逐新史学相关理论范式,心理史、历史社会学、书

① 因为有部分是史学史、史学理论和通论类论文,所以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论文数量相加不足708篇。这部分文章数量约为158篇,占比22.32%。

② 张贵永:《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华冈学报》1965年第2期;徐先尧:《德国迈乃克教授的历史学》(上、下),《大陆杂志》第15卷第9~10期,1957年;徐先尧:《迈乃克对于兰克和布尔克哈尔特的观点的转变》(一、二、三、末),《大陆杂志》第28卷第9~12期,1964年。

③ 阎沁恒:《汤恩比的史学方法及观念》,《政大学报》1970年第22期;阎沁恒:《汤恩比论美国早期历史》,《美国研究》第1卷第3期,1971年;周梁楷:《汤恩比的历史和社会改革思想》,《食货月刊》第13卷第11、12期合刊,1984年;黄大受:《通儒汤恩比》,《中兴文史学报》第7卷,1977年;周梁楷:《卡尔及巴特菲尔德史学理论之比较》,《中兴文史学报》第5卷,1975年;颜建发:《费南·布劳岱的整体史学》,《史学评论》第7卷,1984年;周梁楷:《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7卷,1984年。

④ 周梁楷:《论阿克顿在近代史学思潮中之地位》,《中兴文史学报》第6卷,1976年;邢义田:《罗斯托夫兹夫与“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1版序言译文,《食货月刊》第13卷第11、12期合刊,1984年;夏伯嘉:《亨利·皮乐与欧洲中古史研究》,《史学评论》第2卷,1980年;夏伯嘉:《欧洲中古时期的商业革命:罗拔·罗佩司(Robert Lopez)著作简介》,《史学评论》第3卷,1981年;周梁楷:《那米尔的历史思想》,《食货月刊》第14卷第9、10期合刊,1985年。

籍史、观念史、性别史、儿童史、动物史和影视史学等接踵而至<sup>①</sup>。

第二,论题聚焦于西方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关注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轴心问题。因其规模较小,研究人员不足,台湾世界史学界往往须兼顾学科建设和个人旨趣,同时试图透过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以点带面,推进整体研究。16世纪以来,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形塑了现代欧洲,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台湾学界对上述问题多有涉及,相当数量的论文围绕着上述事件与进程展开<sup>②</sup>。这其中以台湾学界对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周边议题的讨论尤为热烈,颇有代表性。近四十年来,汪金太、孙若怡、涂永清和杨肃献等多名学者就这一问题发文近二十篇,台湾世界史专业期刊《西洋史集刊》创刊号即冠以“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年”之名,《思与言》杂志也在同年由孙若怡策划推出了“法国大革命史研讨会”专号<sup>③</sup>。这些研究也凸显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传统与变革。1982—1988年间,涂永清、汪金太和孙若怡等人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大革命爆发原因、进程以及继承与断裂等传统问题,之后的议题则明显地受到了性别史、思想史和计量史学的启发。此外,他们还试图在个人研究旨趣和议题中找到平衡。杨肃献早年专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1984年负笈英伦,后以《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辩论——埃德蒙·伯克和他的批判》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近来研究又转向近代欧洲思想史和史学史<sup>④</sup>。透过杨氏的学术履历则不难管窥到,台湾学者在择取议题时,颇为重视重大历史事件、史学趋势和个人旨趣的权衡。当台湾世界史研究积木成林后,学者们逐渐倾向至学术旨趣。

第三,晚近研究带有浓厚的新史学印记。黄俊杰曾撰文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尤

- 
- ① 这里简要地列举大陆世界史学界关注较少的儿童史和动物史成果。尤其值得注意,《成大历史学报》在2020年6月第58号推出动物史学专刊,不仅对动物史学的基本概念、在台湾的书写史和“全球的宠物史”进行界定和畅想,也对亚洲虎人传说、牛的符号和大熊猫团团圆圆来台“团圆史”予以专题讨论。相关研究依次可见林慈淑:《历史教与学的鸿沟——英国儿童历史认知的探究(1960—1990)》,《东吴历史学报》2002年第8期;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斯(Aries)及其批评》,《新史学》第15卷第1期,2004年;李鉴慧:《十九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与基督教传统》,《新史学》第20卷第1期,2009年;李鉴慧:《挪用自然史:英国十九世纪动物保护运动与大众自然史文化》,《成大历史学报》第38号,2010年;李鉴慧:《从“棕狗传奇”论二十世纪初英国反动物实验运动策略之激进化》,《新史学》第23卷第2期,2012年;李鉴慧:《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动物贡献与生命经验初探》,《成大历史学报》第58号,2020年;李鉴慧:《一篇多物种遭逢的故事——十九世纪伦敦史密斯菲尔德活畜市场搬迁争议》,《新史学》第32卷第1期,2021年。
- ② 比较典型的有蒋孝禹和李若庸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汪金太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孙同勋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王琪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史的讨论、吴圳义对二战后法国史的研究等,涉及这些专题讨论的文章数量众多,仅上述6名学者便刊文56篇,台湾学界对专题讨论的热烈可见一斑。
- ③ 笔者目力所及,截至2021年相关论文多达近二十篇。此处举其要者为:涂永清:《由经济因素析论法国大革命》,《成功大学学报》第17卷,1982年;汪金太:《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冲击及其政治意义》,《政大历史学报》1983年第1期;汪金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解释》,《政大历史学报》1984年第2期;汪金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起源及其发展》,《政大历史学报》1985年第3期;汪金太:《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与美德共和国》,《政大历史学报》1986年第4期;孙若怡:《由征服战到侵略战——法国革命期间督政府及其执政府时期(1795—1804)的对外侵略》,《中兴文史学报》1987年第17期;汪金太:《旧王朝与法国大革命:持续与变迁之商榷》,《政大历史学报》1988年第6期;孙若怡:《法国大革命立法会议时期的党派冲突》,《中兴文史学报》1988年第18期;涂永清:《妇女与法国大革命(1789—1795)》,《西洋史集刊》1989年第1期;王琪:《施坦因之改革理念与法国革命的关系》,《西洋史集刊》1989年第1期;杨肃献:《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激进派的人权理论》,《台大文史哲学报》1990年第38期;林慈淑:《解读柯本著〈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1715—1799〉》,《东吴文史学报》1990年第3期;刘增泉:《法国大革命时期道多尼省和洛省的国民义勇军营》,《辅仁历史学报》1992年第4期;杨肃献:《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一个解释传统的解体》,《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杨肃献:“埃德蒙·柏克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Edmund Burke on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台大历史学报》1994年第18期;熊彬彬:《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口(1600—1789)》,《兴大历史学报》2006年第17期;《思与言》第27卷第2期专号,1989年。
- ④ 以下依据时序列出杨肃献研究成果概要,上文已出现者省略。杨肃献:《关税与分裂时期北京政府财政(1916—1928)》,《食货月刊》第8卷第8期,1978年;《从张之洞的“勤学篇”看晚清的保守主义》,《食货月刊》第9卷第10期,1980年;《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的保守思想——“中体西用论”的成立及其历史意义》,《大陆杂志》第64卷第6期,1982年;爱丁堡大学1990年博士论文《英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埃德蒙·柏克及其批评者》(《The British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mund Burke and his Critics》);《英格兰有启蒙运动吗?——历史家论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启蒙运动》,《新史学》第9卷第4期,1998年;《青年吉朋——一位罗马帝国历史家的养成》,《新史学》第12卷第2期,2001年;《柏克思想与英格兰启蒙运动》,《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2期;《吉朋的史学与近代欧洲的古典学术》,《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从人文主义史学到哲学的历史:吉朋历史书写的近世欧洲史学脉络》,《台大历史学报》2018年第62期;《怀疑论、古物研究与近代欧洲史学的起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20年第64期等。

其注重史学方法论,量化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范式给予历史学以极大启发……这个阶段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为其基本特征<sup>①</sup>。在这股学术潮流中,以性别史、外国族裔史、书籍史以及相关学说引介与学术史梳理成果最为丰硕。1985年后,性别史吸引了相关学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的关注,迄今已有二十余篇涉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题的性别史研究成果<sup>②</sup>。细致考察后不难发现,性别史研究范式带来的革新体现在多个维度之上。首先,这促使学者们开始关注此前研究颇为忽略的女性群体,如吴圳义对二战中的女兵和涂永清对女性与法国大革命以及女巫的讨论。其次,性别史自身的学术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具体有李贞德所关注的欧洲中古妇女史和陈静瑜考察的美国女权运动史。此外,性别史从女权走向平权及其同族裔、种族的结合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也体现。黄文龄对黑人女性的关注、林美香和陈佩璟对历史上跨性别行为的考察,就充分展现了台湾学者对晚近新史学潮流的吸收和运用。性别史的热络场面并不是个例,新史学在台湾世界史学界流布甚广,新文化史、书籍史以及后现代史学都能找到一定数量的拥趸和实践<sup>③</sup>。

第四,研究视角呈现出“从中国看世界”到“从台湾看周边”的位移,“去中国化”的意图明显。杨国枢曾指出,台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返乡”到“此处即吾乡”的认知变迁。这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浪潮一起塑造了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sup>④</sup>。世界史研究虽以外国史为主要对象,仍不可避免地受此波及,学界对华人华侨史和晚近国际关系的讨论印证了这一判断。1980年前后,台湾学界有零星学者关注到华人华侨的问题并涉足其中,他们大体上仍以“中国”作为其思考和立论的出发点<sup>⑤</sup>。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断地回溯国民党败退台湾和台海危机前后台

- 
- ①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该文曾以《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1971—1981)》《近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为题分别刊于《汉学研究通讯》和《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
- ② 这些成果依次有黄富三:《女工与纺织工市场的扩张——工业革命时期》,《食货月刊》第5卷第5期,1975年;吴圳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兵》,《政大历史学报》1985年第3期;涂永清:《妇女与法国大革命(1789—1795)》,《西洋史集刊》1989年第1期;王琪:《纳粹主义运动下的德国妇女》,《西洋史集刊》1991年第3期;李贞德:《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妇女史研究》,《新史学》第4卷第2期,1993年;涂永清:《女巫之研究》,《西洋史集刊》1993年第5期;陈静瑜:《美国争取票权运动的领袖:史坦敦的“新女性”表现》,《中兴文史学报》第24卷,1994年;陈静瑜:《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析论(1960—1990)》,《兴大历史学报》1994年第4期;汪雅玲:《印象主义与女性艺术家的发展空间》,《辅仁历史学报》1994年第6期;林立树:《一九五〇年代美国同性恋团体理念与发展探讨》,《辅仁学志》第24卷,1995年;林美香:《女性与政治:汤玛斯艾列特的〈为好女人辩护〉与十六世纪人文学者的“女主宝鉴”》,《台大文史哲学报》2001年第55期;林美香:《十六世纪英格兰女性统治的建立——以女王为主体的探讨》,《新史学》第14卷第3期,2003年;黄文龄:《纽约市妇女会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以197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开放入学政策为例》,《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5年第33期;卢文婷:《变迁中的美国华人移民妇女政治地位析探》,《兴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20期;林欣怡:《“…而女人是她的人性”——中古晚期宗教书写中的女性意象》,《辅仁历史学报》2008年第21期;俞彦娟:《从女权到人权:美国女选民联盟的公民行动》,《辅仁历史学报》2010年第25期;黄文龄:《1916年“黑人女性全国联盟”接管“道格拉斯之家”动机之研究》,《东吴历史学报》2012年第28期;陈佩璟:《跨越性别的界线: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和男性的变装行为》,《东吴历史学报》2013年第29期;刘文彬:《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女性选举权之影响》,《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5年第53期;刘文彬:《二十世纪初法国妇女选举权的困境与突破》,《中正历史学刊》2016年第19期;林美香:《“阳刚女”、“阴柔男”: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女性时尚与性别争议》,《台大文史哲学报》2018年第89期等。
- ③ 受篇幅所限,此处列出具有代表性的论作。刘翠溶:《近二十年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美国研究》第5卷第2期,1975年;《近二十年欧美历史人口学之发展》,《美国研究》第7卷第3期,1977年;周惠民:《从人口现象看三十年战争》,《政大历史学报》1993年第10期;张四德:《认同感与输诚忠心——论美国种族歧视下少数民族的处境》,《西洋史集刊》1990年第2期;杨豫:《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新史学》第1卷第3期,1990年;夏伯嘉:《战后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3年;王心扬:《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新史学》第6卷第3期,1995年;周梁楷:《影视史学:理论基础及课程主旨的反思》,《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论:从观念史的思考到决定论的批判》,《台大历史学报》2005年第36期;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秦曼仪:《绝对王权下贵族的书写与出版——拉侯什博科公爵的〈道德箴言录〉与巴黎菁英读者》,《台大历史学报》2015年第55期等。
- ④ 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 ⑤ 典型者有,刘渭平:《十九世纪华侨移殖澳洲之经过与白澳政策之形成》,《史学汇刊》1970年第3期;魏良才:《一九二〇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美国研究》第8卷第3期,1978年;陈三井:《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对华政策》,《近史所集刊》1980年第9期等。

湾同大陆、日本和美国的 多边关系,建构台湾与美国的战略定位<sup>①</sup>。还有学者将爱尔兰、朝鲜和台湾三个曾被殖民的地区进行比较,提出台湾因清政府在日殖初期借“官民内渡”抽离了本土中产阶级,破坏了台湾社会结构的完整,不利于后者发展出完整的民族意识;台湾甚至由于日据时期的人才训练、国民党的“以德报怨”,抗日情绪已然不复可寻<sup>②</sup>。同时,相关学者的治学转变及其“现实关怀”,清晰地展露出“去中国化”的思想苗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台湾的勃兴。台湾学界台美关系的重要研究者、供职台湾大学的赵绮娜和台湾“中研院”的张淑雅,同出自陈捷先门下,分别以《清初东北的驻防八旗》和《清末广东四大书院的研究》取得台湾大学中国史硕士学位,都在随后转入美国外交史,尤其是台美关系研究<sup>③</sup>。这其中,赵绮娜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恰逢美国政府与台湾断交(1978 年)。受此震撼的赵绮娜将研究重心向台美关系进一步转移,寄希望透过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以理解美国外交,尤其是美国对台外交的考量<sup>④</sup>。这是当代形势所酝酿的多元认同投射学术场域的结果,也是台湾部分世界史学者受到“本土化”风潮之影响,将研究同本土政治动向结合,寻求“去中国化”的真实写照。这种追随政治动向的研究并不可取。

当然,以上只是对台湾世界史学者七十多年来议题的宏观把握,另有一些诸如“意大利的簿记论”和近代法国畸形胎儿等研究<sup>⑤</sup>,也展现了台湾学者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涉猎地域、主题的广泛多样。尽管台湾世界史研究在引进西方史学的过程中步步推进,学术议题呈现出新旧嬗变的趋势,但受制于狭小的人员体量规模,在古代中世纪史方向后继乏力,对重大事件之外的历史也涉猎较少,忽视对基础问题的讨论,尚未建构起自身的研究体系。总的来说,台湾世界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时代浪潮的涌动、史学风气的变迁、现实政局的异动,还是个人学术背景和治学旨趣的差异与变化等都作用于此。由于难免受到“世变”的影响,台湾学者曾“致力于摆脱外在的政治干扰,不过在萨伊德所称‘族群认同’的要求下,政治终于又卷走了学术的自主性”<sup>⑥</sup>。

### 三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1979 年,余英时在《史学评论》代发刊辞中振聋发聩地提出:“在中国的学术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但时至今日,史学在中国竟大为衰落了。”<sup>⑦</sup>看衰史学在台湾学界于此可窥一斑。不过在事实上,台湾的世界史虽不似中国史研究那般有着辉煌的过往与厚重的积淀,然而七十年来踽踽前行,业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杨肃献在 1997 年曾提出,相关成果在 1985—1995 年间显著增长、包括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等十二处史学研究所的建成、西洋史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是这四十余年(1950—1995)台湾西洋史取得的进展<sup>⑧</sup>。2004 年,童长义、杨肃献和王世宗曾对台湾世界史不同领域在 1945—2000 年所取得的进展予以梳理。童长义认为台湾的亚洲史研究在 1955 年之前“较诸共产大陆马列唯物教条史学略胜一筹”,随着 1960 年后政治经

① 赵绮娜:《一九四〇年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台湾战略地位》,《美国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82 年;张淑雅:《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考察(1950 年 12 月—1951 年 5 月)》,《近史所集刊》1990 年第 19 期;张淑雅:《安理会停火案: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一》,《近史所集刊》1993 年第 22 期(下);张淑雅:《台海危机前美国对外岛的政策(1953—1954)》,《近史所集刊》1994 年第 23 期(下);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近史所集刊》1995 年第 24 期(上)。

② 周惠民:《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互动——以爱尔兰、朝鲜半岛及台湾地区为基础之比较》,《政大历史学报》1994 年第 11 期。

③ 赵绮娜:《清初东北的驻防八旗》(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1973 年;张淑雅:《清末广东四大书院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1980 年。

④ 赵绮娜先后在 1979 年、1990 年取得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1979—1981 年曾返回台湾服务。她的硕博论文分别为:赵绮娜:《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冷战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Ena Chao,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aiwan: A Study in Cold War Policy-making*);赵绮娜:《“中国帮”:美国国会与对外政策的制定(1947—1952)》(Ena Chao, *The China Bloc: Congres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2013 年,张淑雅在赵绮娜的追悼会上曾从台湾本土的立场上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评价。参见石昇垣:《“赵绮娜教授追思会”纪实》,《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2013 年第 15 期,第 8~10 页。

⑤ 丁人:《最早期意大利簿记与 Paciolo“簿记论”之研究》,《政大学报》1964 年第 9 期;杨彦彬:《母亲想象力与胎儿畸形:近代法国学界对于怪物诞生成因之讨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8 年第 60 期等。

⑥ 许倬云:《序言也是一番反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第 1 页。

⑦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康乐、彭明辉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 1 页。

⑧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 年第 12 期,第 303~309 页。

济条件改善,研究朝向客观性、相对性、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杨肃献和王世宗则分别提出台湾的“西洋上古史研究冷僻、中古史研究荒芜、近代史研究相对成熟、现代史研究多于前代,但主题分散、不易形成全面的关照和宏观的识见”<sup>①</sup>。这些看法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有其合理性。不过二十余载已去,且仅立足台湾一隅不免偏狭,对七十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之成就的把握,须放置于更加广阔的学术场域之中去考量。

概而观之,台湾世界史在民国西洋史学术传承、本地区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话语形成、台湾地区历史学范式更新,乃至中国世界史整体研究主题多样性与华语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其成就彰显于以上多个维度之间。

可以说,台湾世界史传承了民国西洋史的研究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与中国大陆学界不同的路径。1949年,一批西洋史学者南渡台湾,西方史学随之传入。杜维运所作《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有云:“在台湾大学讲学的张致远(张贵永,字致远)、姚从吾、沈刚伯、刘崇鋳诸教授,是此一时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台湾)输入西方史学极重要的人物。”<sup>②</sup>上述民国西洋史名家的播迁,事实上将清末民初以降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观点影响的西洋史迁移至台湾,同时也造成了大陆和台湾地区所谓“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的分野。落地台湾的西洋史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名为西洋史学,实为借西洋之“新史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意在“启蒙”和“救亡图存”,学术色彩淡薄。这种风气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踪迹可循。1984年,黄俊杰在《历史的探索》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在西洋史的领域里,古希腊史尤启我遐思,心神向往……但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只要对希腊古史做一个最浮面的观察,并采取而与国史的发展历程一并思考,则立刻会面对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何以古希腊城邦所行之民主政治可出现于近代西方世界而先秦之邦国林立未能为国史开出民本政治之格局?这个严肃的问题值得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人作一番理性的反省<sup>③</sup>。

透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以思考中国出路的取向,是民国西洋史遗留给台湾和大陆共同的、未竟的壮志。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科学界“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浪潮兴起,这一学术诉求大有退隐之势,使其世界史研究在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警惕态度的同时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sup>④</sup>。这种开放的“自由化”给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和新兴研究领域进入台湾世界史学界提供了契机,进一步提升其研究的多样性。于民国西洋史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取向多元、研究主题丰富的现代世界史学术群体,无疑是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学界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这又同中国大陆的世界史同仁一道,丰富了汉语界的世界史研究。

台湾的世界史研究还深刻地参与并形塑了台湾史学的发展变迁<sup>⑤</sup>。余英时、王晴佳等学者在考察台湾史学风气流变之时,往往以中国史学者及其论说作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依据,从而忽视了世界史的声音<sup>⑥</sup>。虽有学者自谦世界史居于台湾史学界之中“成绩有限、无足轻重”<sup>⑦</sup>,但台湾的

①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8册:世界史),第1~7、69、95、119、199页,在保证原意的基础上略有改动。

②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大历史学报》1976年第3期,第436页。

③ 黄俊杰:《历史的探索·自序》,水牛大学丛书53,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④ 台湾世界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讨论较少,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方才谨慎涉足。如杨肃献:《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一个解释传统的解体》,《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3年,第35~56页;周雪舫:《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之研究》,《辅仁历史学报》1992年第4期,第245~268页等。

⑤ 王晴佳教授将1945—2010年台湾史学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及其门人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其影响时段大致在1949—1960年代中期;第二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负笈海外的历史学人,他们致力将欧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台湾的历史研究之中,其研究由国家政治军事和典章制度,转向社会经济诸课题,其活跃时间大致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7年结束“戒严”;第三代的活跃者大都为第二代之学子,他们工作的重心转向文化史、台湾史,其时段在1987—2000年后。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⑥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第1~19页;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初版序言,第2~4页。

⑦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12期,第295页。

世界史学者及其研究在引介西方思潮、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台湾史学风气转变等方面居功甚伟。1983年,黄俊杰曾撰文讨论1950—1980年间台湾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着重发掘并肯定了世界史学者居于其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史料学派”主导台湾史学研究之际,“除了傅斯年及姚从吾两先生外,在这个时期(1950—1970年)里致力于德国史学介绍的,尚有张致远先生”。而张氏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其所著书《史学讲话》有引介阐发班海穆(Ernst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之功;主张史学研究当以“史源学”为主体;其所谓“史源学”即史料的研究、考证、解释、组织与叙述的工作<sup>①</sup>。随后在1970—1980年间的史学与社会科学综合时期,世界史学者活跃其中,在量化史学、心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观念等台湾史学界最为关心的方向着力甚多<sup>②</sup>。

黄文所述不是孤例,不同年代的世界史学人在台湾史学的激荡发展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史料学派”代表人物傅斯年的好友、同为战后台湾第一代历史学者的沈刚伯,便以开放的态度面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史学风气变迁。1968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40周年之际,沈刚伯作了题为《史学与世变》的演讲。他认为史学是以人为本之学,史学是随着世事变迁而变,史学也当随着世事变迁而变,即“史学产生以后,物质环境仍然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越急,则史学变得越快;世变越大,则史学变得越新”<sup>③</sup>。王晴佳提出,沈刚伯透过这番演讲明确表明“史语所所代表的治史风格已经过时”<sup>④</sup>。事实上此番演讲不仅标志着世界史出身的沈刚伯跟“史料学派”的告别,更为随后数十年台湾史学随世变而变谱写了基调。

沈刚伯以后,更多的世界史学者投身于台湾史学逐浪于西方史学的新潮之中。例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尤为活跃的黄俊杰,彼时热烈地引介、评论西方史学研究范式,积极推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对话。2013年,潘光哲在回首《思与言》创刊50年来与历史学的激荡缠结时,对黄俊杰颇为赞赏。他指出,“1972年,还仅是台湾大学历史所研究生的黄俊杰,即翻译了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对于史学与社会学之间进行‘有益调和’的文章……引介韦伯更为其此后工作重心之一……(黄文虽非最早的作品)实若继承《思与言》对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关怀旨趣,委实乃当时史学风气转变之旗手”<sup>⑤</sup>。诚如潘光哲所言,黄俊杰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推进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对话,更准确地则是推动台湾史学效法西方史学并借鉴社会学之研究范式,扭转台湾史学风气。

1977年,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一书,集中将西方史学同社会学交融的讨论引入<sup>⑥</sup>。1981年增订时加入《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将其诉求予以明确。此文涵盖三个层次。其一,驳斥所谓历史学与社会学有“重大差异”。此观点云“史学研究之焦点在于‘变’与‘常’,社会学关注‘类’与‘型’;前者纵向剖面式,后者横向切面式;史学研究希图厘清人类行为之因果关系,故重在‘过去’、在个案,社会学研究则旨在建立人类行为之普遍模式,故重在‘现在’、在通则”。对此,黄俊杰列举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直陈上述两书乃中西史学共有的、分门别类地撰写历史的典范,直言“史学与社会学在类型研究上之差异仅可谓程度上之差别而非性质之上重大不同也,而特殊性与普遍性之说法亦言过其实……史学与社会学皆以‘人’为其探讨的对象,两者之间有侧重点的不同,而无根本性质之差异”。其二,批判百年来西方社会学之积弊。他提出,“(社会学相关研

①②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279~280、291~301页。

③ 沈刚伯:《沈刚伯先生文集》,第63~75页。

④ 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第48~49页。

⑤ 潘光哲:《〈思与言〉的史学实践》,《思与言》第51卷第4期,2013年,第46~46页,引文略有改动。潘光哲在文中提及黄俊杰的多篇译作,依次为:《思想史及其相关学科》,《食货月刊》第7卷第3期,1977年,第45~50页;《科学方法与史学家的的工作》,《思与言》第9卷第6期,1972年,第41~46页;《韦伯对于人类行为与历史的解释》,《思与言》第14卷第1期,1976年,第33~39页;《社会学的类型研究与历史解释》,《思与言》第14卷第4期,1976年,第30~39页。根据黄俊杰的学术履历可以发现,他在1987年后逐渐转入了中国古代史与台湾史相关的领域,这不能否定他曾作为世界史学者活跃于台湾史学风气丕变之际。<http://huang.cc.ntu.edu.tw/about.html> 2021年9月1日可见。

⑥ 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出版社1977年版。

究)缺乏历史的眼光而且看问题多以欧洲为中心,无形之中遂以欧洲近代发展之经验作为人类社会之普遍模式;过分机械式地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观念,末流所及遂无形中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为不相敌属之敌体”<sup>①</sup>。其三,主张史学与社会学实为“共生之关系”,认定“史家与社会学家贵在相济、不在独申”。他指出,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与社会学交相影响,转相求益实已使双方在研究方法上共蒙其利、日上层楼;史学与社会学在问题意识的形成上互作辩证刺激……吾人提倡史学与社会学之合作,其目的在于求取两者间动态之平衡与辩性之互动,而非沦史学为社会学之婢女也”。在他看来,史学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既能拓展传统中国史学理想之通识心胸,又可补史学家拙于论“常”之弊”<sup>②</sup>。同时,“传统的叙述性史学作品有其限制,而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正是解决历史的综合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社会科学的基本发现,学术关怀及其学科视野对于史学均大有助益,有助于史学的叙述性作品及其专论作品在写作方式上的突破”<sup>③</sup>。黄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此时台湾史学风气转向的学术风向标,在进一步推动台湾史学拥抱社会科学上作用甚大。在这前后,台湾的一批世界史学者对马克斯·韦伯、年鉴学派、汤因比,以及晚近的西方史学流派进行介绍,并尝试着运用新的范式进行研究,这也推动了台湾史学加深对西方史学动向的把握和理解。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台湾史学转向,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台湾史学界对二战后西方史学成果的积极吸纳。在助推台湾史学风气持续转变上,台湾世界史学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不仅与台湾世界史自身的发展轨迹相契合,由此也凸显了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之于台湾史学界的重要意义。

如果将视角转移至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语史学界,则不难发现,台湾世界史对于丰富中国、乃至整个华语的世界史研究学术意义重大。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沟通不畅,台湾世界史研究对大陆影响有限。然而,海峡两岸的世界史不仅都源于清末民初之民族危亡之际发轫的“西洋史”,且活跃在同一个研究场域之中,存在着交流互通的基础。这一隔阂伴随着两岸关系缓和而逐渐改善,沟通互动也已井然有序进行。近年来,台湾世界史学人纷纷前来任职讲学,两岸世界史学界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交流日显密切。2006年,杨肃献、王文霞和王琪便应邀出席“北京论坛”,并在会议中就各自研究专长作主题发言<sup>④</sup>。2014年,在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的推动下,第一届“两岸学者共话·世界史”论坛成功举办,两岸世界史学者首次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如今已成功举办四届<sup>⑤</sup>。同时,诸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杜宣莹和南开大学的徐诗薇等多名台籍青年学者前来执教,也为大陆世界史教研带来新鲜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确定将15个学科30种台湾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纳入来源期刊,把“鼓励台湾教师来大陆任教,其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可纳入工作评价体系”这一“惠台措施”予以落实。台湾方面早在2005年就已对大陆之历史学期刊物进行调研,“国科会鉴于两岸学术交流之频繁,且投稿中国大陆历史学期刊学者增多,为求进一步了解,特委托黄宽重为计划主持人,李贞德、吕妙芬为共同主持人,执行‘历史学国际暨大陆期刊评比之研究’计划……(以)建立两岸学界对中国期刊学术品质之共识,希望有助于国际汉学界了解华文学术期刊之水准”<sup>⑥</sup>。此外,台湾世界史一些细分领域的研究成果,也给予大陆学者以启发。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在继承民国西洋史传统的基础上,走上同中国大陆不同的多元价值取向之学术道路。台湾同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推动了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而且促进了华语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在本土世界史、台湾历史学与华语世界史学术之中,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肯定。

①②③ 黄俊杰:《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黄俊杰:《史学方法论·序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增订版,第5~34、20~24、25页。

④ 三人所作的发言主题依次为“柏克思想与英国启蒙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工会运动(1880—1914)”和“俾斯麦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法的背景探讨”。

⑤ 四届论坛进行时间和地点依次为:2014年8月22—23日于北京、2016年10月20—21日于北京、2018年4月28—5月1日于台北、2020年11月21日于上海与线上同时进行;论坛先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首次会议,北京大学历史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依次承办。

⑥ 黄宽重等:《“历史学国际暨大陆期刊评比之研究”成果报告》,《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第8卷第4期,2007年,第86页。

#### 四 对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反思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有无不足之处,其进路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须考虑台湾本土学者的相关讨论,更有必要纳入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以及整个华语人文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认识和把握。总的看来,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全盘西化后,在有着强烈意识形态介入的“本土化”浪潮的涤荡下,逐渐形成了“自我与他者”“台湾化与中国化”两极对立主导下的研究取向。1986年,台湾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西学“中国化”运动方兴未艾。台湾学者杨国枢曾对台湾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过辛辣的点评:

过去三十年来,台湾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依赖他国的边陲地位中进行,好像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除了纯粹是传统汉学的部分(如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及中国习俗等),在其他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范围内,台湾学者的教学内容大都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几乎也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他们以介绍、模仿及套用西方学者的理论与方法为能事,以探讨西方学者以及研究过的课题为得计。甚至在传统汉学研究范围内,也有不少人以生搬硬套地运用西方理论为乐事。影响所及,多年以来,台湾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已成西方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附庸,使前者长期难以建立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难以在国际上对有关学术提供独特而重要的贡献<sup>①</sup>。

杨国枢也观察到了台湾学界为摆脱“附庸”地位所做的努力。他指出:“此间部分社会及行为科学者,在反复思考与辨难之后,咸认要在自己学科中对世界学术提供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就必须摆脱或超越学术的边陲地位,要超越边陲地位,就必须建立独立性与自主性;要建立独立性与自主性,就必须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能真正中国化。”<sup>②</sup>杨国枢的议论是彼时台湾学者批判西方研究范式和议题主导学界的缩影。这之后,“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浪潮袭来,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纷纷发掘本土议题,检讨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论<sup>③</sup>。抵制机械模仿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浪潮一时成为台湾学界的主流。但是,“中国化”或“本土化”波及的学科往往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客观上可以将中国和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体到历史学门类,台湾地区的历史学受此指引则兴起了“台湾史”研究。那么,以外国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学科是否能回避杨国枢的批评和“本土化”的讨论呢?换言之,回溯1945—2021年来台湾的世界史研究,有哪些不足应当反思呢?

台湾学者对此的反省耐人寻味。黄俊杰指出研究者缺乏文化立场是台湾西洋史研究亟需反省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研究西方历史文化的传统,多俯拾西方学者的成就,以若干西方著作作为根据来阐释西洋史。于是,在中文的西洋史著作及专刊中,读者所见的多系西方文化人的观点,而不是东方文化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观点与解释。”<sup>④</sup>他对此深表担忧:“(西洋史)研究虽多,但不能形成一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解释体系。”<sup>⑤</sup>邢义田曾应邀点评回应上述观点,他认为:“从所谓‘自我文化’的立场研究或解释其他文化与历史恐皆难免一偏之见;近百年来国人研究西洋史最大的危机不在缺乏立场,而在缺少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固,所谓‘立场’‘解释’都是空中楼阁;要使外国史研究真正在国内生根,非从史料掌握和专题研究做起莫辨。”<sup>⑥</sup>两位学者所述分别着眼于宏观和微观,看似矛盾,实则欲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阐释逻辑和实践路径指明方向。这之后,杨肃献曾在两人讨论的基础上继续求索。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显然由于研究环境的关系,台湾的西洋史一直是维持在相当基本的层次;学者们的著述,大抵还停留在教科书之类的作品上,谈不到具有史识的研究成果。”<sup>⑦</sup>不过,杨氏的评价主要着眼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就是台湾世界史尚未成型之时期,未能涵盖近四十年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进展。

① 杨国枢:《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经验》,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9~10页。

② 杨国枢:《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经验》,第9~10页。

③ 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⑤ 黄俊杰:《关于西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点考虑——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反省》,黄俊杰:《历史的探索》,第16、19页。

⑥ 邢义田:《“世界史”抑或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黄俊杰:《历史的探索》,第31~46页。

⑦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12期,第299页。

林正珍对台湾世界史此一状况的批判则更加深刻。在他看来,“整体而言,晚清以来至当前台湾学术界(1999年),对西洋史的研究与教学,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问题。除了基础研究的根本欠缺之外,有关西洋史在研究与教学上的重大问题,最主要来自于认知偏见,所造成文化视野的限制”。林氏所谓认知偏见实指“欧洲中心思想”长时间主导了世界史的教研,由此造成对自身或其他文明模式的漠视。换言之,即西方历史发展的叙述模式将自身塑造为现代化的唯一典范,进而笼罩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导致后者无法建构文化主体性<sup>①</sup>。他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观察西方史学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叙述的侵蚀,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只是其切入议题的视角之一。即便如此,这一看法对于理解和反思台湾世界史研究仍颇有启发。

综合学者们对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及世界史研究的反思,辅以上文的分期与问题意识,即可看出,七十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便是缺乏学术主体意识,由此产生了诸如自身话语体系缺失、研究议题分散、学脉赅续孱弱、无法剥离意识形态左右等诸多流弊。

这些流弊从根本上讲正是台湾世界史研究缺乏主体性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台湾学界未能构建起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层出不穷的西方史学流派与理论更迭牵引着台湾的世界史研究,主导了学者研究的议题及其书写的范式。不可否认,世界史是以外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本国或本土的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只是研究范畴的类别上的差异,而非视野上的分割。事实上,借助中国的史学资源与史学眼光来考量世界史,十分必要。就在“西洋史”方兴未艾的民国年间,胡适便已撰文强调“他者”视角和观点的重要性:

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sup>②</sup>。

但台湾世界史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远不尽如人意,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忽略了学术主体性的建构,台湾世界史学科建设未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学者们聚焦的时段、地域和主题分散,学术研究尚未展现足够的集聚效益。诚然,学术研究乃个人旨趣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涉及本土学科建设和学术气候的形成,则需将个人意愿同学科发展相结合。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学者,尤其是杨肃猷、秦曼仪、花亦芬、林美香和李若庸等,大都在欧美高校取得博士学位,随后研究多遵循以其个人旨趣或接续博士选题深耕拓展。例如,林美香在2000年以《“女主宝鉴”——英国女王统治的形成(1553—1603)》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返台后,她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近代早期欧洲史、欧洲服饰文化史和文艺复兴史。一定程度上,这种治学之路是构筑本土世界史知识体系和研究的重要途径,但在理论方法、研究范畴上远不能满足构建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需要。此外,台湾世界史队伍体量较小,这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世界史专业人才稀缺,其学术研究缺乏传承。这既是未能塑造学术主体性的重要原因,又是缺乏主体性的结果。彭明辉曾对1945—2000年间台湾地区博硕论文进行过计量分析,在他所收集的2008篇论文中,“中国史占73.0%,台湾史15.9%,外国史11.1%”<sup>③</sup>。彭文所述的外国史“包括国别史、西洋史与世界史,即中国史与台湾史之外的历史研究均归入此一类别”<sup>④</sup>,这样一来属于纯粹“世界史”的无疑更少。同时,活跃在台湾世界史群体的学者,绝大部分是在海外高校取得学位。不可否认,他们接受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系统地掌握国际研究动向,善于追赶学术潮流。然而,这些海外学子往往在“他国”、或冠以“世界”的学术框架中发掘问题,确定研究对象,对本土和中国自身的学术史缺乏清醒的认识。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台湾本土世界史研究的接续。此外,外文写作侵蚀了中文的学术场域。笔者收集的1956—2021年台湾世界史论文共计708篇,其

①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9期,第181~190页。

②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胡适:《胡适书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③④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取向:一个计量史学的分析(1945—2000)》,彭明辉:《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205、164页。

中英文写作论文 54 篇,占比 7.63%。考虑到台湾世界史的研究规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英文写作与发表是学者研究能力与书写功力的体现,也是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必要前提,但学术成果为中国读者所理解接受、培养学生学术兴趣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sup>①</sup>,如何权衡二者理应慎重。

无法剥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也使台湾世界史学界难以凸显学术主体性。1949 年国民党败逃台湾,持续近四十年的“戒严”和长期对大陆的敌视,以及台湾当局刻意渲染的“台独”意识,对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影响深远。与之相应,“返乡情绪”“正统中华的代表”和“台独”意识先后笼罩着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史研究概莫能外。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投射到历史学研究之上,带来了“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对立分野,以及对“史观学派”的刻板印象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片面排斥。余英时对“史观学派”的批评便是一个例证。他不由分说地将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冠以“史观学派”;批评“史观学派”与时代结合的过分密切,“自始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的,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的”。他甚至强调,“史观学派”主导的大陆史学界“完全从现实政治的要求出发,最后必然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走向极端便是其所谓“影射史学”。他还认为唯物史观对历史“规律”(laws)界定模糊,批评“人类社会五种阶段”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论断<sup>②</sup>。这种曲解附会是对立两分的“台独”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流弊。他甚至武断地判定“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 1949 年后势同水火地分别落地于台湾和大陆,在对大陆史学研究缺乏系统认识、对唯物史观认知扭曲的前提下,着力批评“史观学派主导的大陆历史学研究”。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渲染两岸学术对立和对大陆史学片面化的解读,深刻地反映了台湾当局长时间刻意塑造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之于台湾学界的熏染。同时,“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截然对立,导致台湾的世界史学者大都着眼细微之中,不问通观与阐释。相关研究因此“支离破碎、不识大体”<sup>③</sup>。以台湾世界史着力最多的欧美史为例,尤其是英国史,迄今未见台湾本土学者所著之外国通史论著。

情况表明,尽管过往七十余年中台湾世界史研究取得一些成就,并在推动台湾史学转型中做出积极贡献,但却未能建构起自身学术研究的主体性,由此而产生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乃至缺陷,需要在日后的学术拓展中予以解决。

## 五 结 语

本文只是从学术发展脉络、问题意识、成就与不足四个侧面对 1945 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世界史研究予以轮廓式的梳理和勾勒。可以明确的是,台湾世界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步入正轨,1990 年至今密切追踪西方学界前沿,相关研究在议题、范式和理论选取上进展显著。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接续民国西洋史的根本与不断追踪西方史学的潮流,渐次展开多元价值取向的研究,由此推动了台湾史学转变与华语世界史学术的进步。然而,台湾世界史学术体系建设步履蹒跚,更难觅到其学术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台湾地区的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密切相关。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进路何在?在这一涉及到学术发展前景的大问题上,台湾中国史的建设可为这一难题提供思路。与世界史不同,台湾的中国史学研究与大陆关系紧密,交往密切。2005 年,两岸史学工作者合作编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作为编者之一的邢义田曾在总序中感慨道:“愿意将满园关不住的春色(指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引者注),献给海峡对岸的读者。”<sup>④</sup>两岸史学工作者在人

① 黄俊杰:《关于西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点考虑——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反省》,黄俊杰:《历史的探索》,第 26 页。

②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第 4~9 页。

③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第 1~19 页。

④ 邢义田:《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总序》,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 5 页。

员、史料、观点和方法上的交流,对两岸史学的发展无疑大有裨益。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各自展开的。大陆的世界史研究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引,经过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五朵金花”等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在批判苏联式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后,已经深层次地发掘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内涵,进而探索自身的学术理路和阐释逻辑,现已初具规模并拥有自身的研究特色,正着力构建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台湾的世界史研究虽受研究规模、学科定位和政治环境限制较多,但仍有一些具体问题和领域上自有建树。显而易见,两岸世界史研究拥有交流合作的基础,存在互补共进的空间。大陆可为台湾学者提供坚实可靠的国族认同归属,现有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能为后者带来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启发;而台湾学界的研究则能补充前者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升其议题的多样化。双方交融互通最终有益于繁荣中文世界的世界史研究。

加强两岸世界史学术交流、人员交往与学术争鸣,无疑是台湾世界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大陆学者可与台湾学者切磋交流、碰撞智慧的火花,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可为台湾学者提供更多的求职空间;学术期刊则能为他们提供更加广阔、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园地。这些年来,两岸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访问、人员就职、学术刊物互通互载文,逐渐井然有序地进行,而推动双方进一步深入交流借鉴,也是中国世界史构建“三大体系”应有的题中之意。

收稿日期 2021-07-04

作者孟广林,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 In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Taiwan, 1945—2021

Meng Guanglin and Zhu Wenxu

**Abstract:** Taiwa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past 76 year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initial period from 1945 to 1970, the elementary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1970 to 1990 and the new stage from 1990 to 2021. By examining its topics and interpret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ir academic circles focus on the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15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They are actively tracking the trend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their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presented the displacement from “viewing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to “viewing the surrounding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 Therefore, a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in inheriting the Western history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construct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ystem of local world history, and to promote and prosper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ubject consciousness, it is inevitable to breed many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discourse system, the dispersion of research topics, the continuous weakness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the disturba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o 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This is also the subject to build the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Keywords:** Taiwan; Study of World History; Western History; Academic Subjectivity;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 李 恒 吕满文】